

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和谐公正

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开放、和谐、统一、强盛

中国向何处去

--- 中国新民主社会主义导论

浩乾 著

中国盛世网制作发行 [greatchina.biz](http://www.greatchina.biz)

铲除贪污腐败，追求民主公正；复兴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

沟通两岸三地，促进中华团结；探索强国之路，开启千年盛世。

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开放、和谐、统一、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 !!!

目 录

鸣 谢

序 言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三章 苦难的民主之路 -- 百年之梦

第四章 专制制度 -- 苦难之源

第五章 一党专制与民主

第六章 民主与社会主义 -- 并非冤家对头

第七章 几种错误思想

第八章 新民主社会主义 -- 唯一的选择

第九章 民主前夜

第十章 结束语 -- 开启千年盛世

附录一 团结一心，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建设一个高度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开放、和谐、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国 -- 致新老领导人的一封信

附录二 正确认识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特征，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大旗

附录三 对江泽民同志十六大留任的看法 -- 写在十六大以后

欢迎访问中国盛世网，正式出版您的著作，参与论坛讨论，
订阅中国盛世月刊，下载精品图书。

鸣谢

仅以此文献给伟大的祖国和人民；献给那些一百多年来为了国家的民主、自由、独立、完整、发达和强盛而上下求索、不懈奋斗、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先烈们、前辈们；献给一直在期待和渴望，饱受饥寒、剥削、欺压、摧残、打击、迫害、侵略、战争，总之饱受过各种苦难的人们；献给过去和未来伟大而可敬的领导人们。

也献给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和曾经教育过我的老师、曾经帮助过我的亲人和朋友们！

愿盛世早日来临，愿无数次满怀希望的人民不再失望！

序言

冷静思考中国问题转眼已过二十几个年头。这种探索过程是断断续续的、也是异常艰难的，有时候感到非常失望，甚至绝望，漫漫长夜，真看不到希望和出路在哪里。

大约在一九八五年後半年，我根据我们目前的制度同封建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得出了中国迟早要出大事，并最终逐渐走下坡路的结论。遗憾的是，这种判断被现实所部份印证。做出判断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六四”事件。随後的十几年，腐败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发展，真是令我始料不及。由於这种悲观的结论，大约从八六年起到九四年左右，我基本上放弃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陷入了一种迷茫期。从九四年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又逐渐开始研究一些问题。九五年左右，我意识到，中国面临著爆发大规模动荡、四分五裂的危险，鸦片战争的局面有可能再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开始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以期能以此为切入点，对国家有所助益，尽量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应该说，这种研究还是有所收获的，逐渐产生了许多想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六点：

1. 中国必须实行民主,这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党专制是死路、是绝路。
2. 西欧一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成份,容易为中国各方所接受,因而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3. 中国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所决定的。
4.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悲剧，也说明中国不能完全一揽子实行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那样只会使天下大乱。
5. 中国必须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6. 略)

所有这些想法，为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概是在零一年底，经过长期的思考，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突然在我的脑际闪过，我终於茅塞顿开。零二年初刚好有一点闲暇，於是有了把它写出来的念头。但产生一种想法是一回事，要把它系统地写出来又是一回事。由於所处的环境，手头几乎没有任何资料；时间又非常紧；我这个人虽然喜欢思考，喜欢实干，但不大喜欢舞文弄墨；要写的问题又是如此异乎寻常地复杂，有时一个问题，连续思考几天，脑袋中空空如也，不知从何下笔。期间又有事情耽误，所以断断续续、勉强强直到现在才写完，几乎是一遍写成，已没有太多的时间再做修改和补充。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全篇几乎没有一个数据，因为我确实没有时间，也无来源去搜集数据。好在我是先产生结论，然後才想办法去论证，整个文章主要是纯思维性的东西，因此用定性的词代替数据到也无关紧要。另外有些地方可能用词不当、语气太重，有些地方可能观点不够准确、逻辑不够严密，还有些地方会有重复或打印错误，还有些地方写得比较罗嗦，不够简洁，甚至与该段的主题有些脱离，因为我总是试图把一些相关的问题都捎带着讲清楚。但不管怎样，总算写出来了。欢迎大家批评，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补充必要的数据。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最终完成这篇文章。

在最后就“六四”问题我再补充两句（主要论述在正文第四章和第九章）。对“六四”事件的评价，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民主化。由於现任的政府领导人都是在“六四”後才上台的，因此，在现任的中国政府领导和绝大多数人看来，对“六四”的平反和正确评价，实际上是对现任政府合法性的否定。这已经成了现任领导人的心理死结。以这样的思路，为“六四”事件平反无异于天方夜谈。我认为：

1. 对“六四”事件的目的应予以肯定。

2. 由於学生组织者的幼稚和不懂政治,把学生们引上了不归路，因此，“六四”事件最後以被镇压而结束，学生组织者们要负一定的责任。

3. 邓小平个人,则要对采取过份严厉的镇压措施负责。至于其他人，即使表过态，也不必心理包袱。责任由决策者一人承担，既敢拍这个板，就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4. 真正的凶手,还是这种专制制度。

我这样分析，是符合事实的，也是公道的。同时，这样分析，也肯定了现任政府的合法性，打消了他们的顾虑，解开了他们心头的死结，从而为平反“六四”事件铺平了道路。

我写这篇文章提出新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具体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国内外各方面的沟通、谅解和协作。二是为政府方面提供一种思路，因为据我观察党内有一大批人包括江泽民、胡锦涛等许多新老领导人实际上都是赞成民主的，他们也一直在探寻中国实现民主的途径，只是由於民主问题的复杂性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及各方面的限制，一时还难以找到比较理想的解决办法。江泽民同志就曾讲过，“腐败的根源是没有民主”。

因为我的本意是促进各方面的和解，因此，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我尽量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对有些问题，我采取了折衷分析方法，在有些地方，我对双方都有批评。由於前面所述的原因，有些地方可能用词不当、语气太重。我想绝大多数人对我的苦心还是能够理解的。尽管如此，难免还会受到个别极端民运人士和党内极端保守派的憎恨和攻击。极端保守派反正是落後于时代的，如果他们不能"与时俱进"，就让历史埋葬他们好了，而极端民运分子，同世界上所有的极端分子一样，是有害于社会的，让他们去自弹自唱自赏独舞好了。

浩乾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一章 前言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深重的苦难史、血泪史。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人民经历了无数的战争、饥荒和政治动荡。有数以亿计的人因之而悲惨地死亡。(泪怎么也止不住地流下来，我为我们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失声痛哭)。在此期间，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民主和自由，为了人民的幸福和解放，许多仁人志士英勇牺牲，也有很多思想家苦苦思索、大胆实践。但是时至今日这种努力尚未成功。我们的国家仍然面临著许多问题，大规模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危险依然存在。

第二章 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政府官员（包括国有企业领导，下同）贪污腐败几乎呈指数上升趋势，其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数额之大，速度之快，恶行之坏，为中外历史上所罕见。许多过去只有在电影等文艺作品中才能看到的人物如南霸天、黄世仁，居然大量复活，且其所做所为，让南黄之流也自愧不如。如果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再现人世，真不知其做何感想！可以说，政府官员的腐败已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严重的腐败现象，不仅极大地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而且象癌症一样扩散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整个社会道德下降，没有思想，失去灵魂，存在著非常严重的信仰危机。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官员的腐败，使得大量国有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原有的工业体系被破坏，几千万职工下岗失业。而许多政府官员则利用手中权力，化公为私，一夜暴富，成为新兴的官僚资本家。当众多的下岗职工衣食无

著之时，把他们赶出企业的官僚们却在继续花天酒地。可以说，人民群众同新兴的官僚资本家的矛盾，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比当年农民同地主的矛盾还要深刻、还要激烈。因为过去的农民同地主之间一般都有长期的佃户关系，而且要成为地主一般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地主的数量也非常有限。而当今的新兴的官僚资本家，同职工之间没有任何的依附关系，且其数量众多、短期暴富、致富的手段主要是化公为私，赤裸裸地剥夺职工。如果不痛下杀手，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使矛盾越来越激化。一旦有风吹草动，大规模的政治动荡甚至战争将不可避免，国家和民族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但老百姓要遭殃，贪官们恐怕也难逃劫难。因为到时候，对抗的各方为了争取民心，必然争相大规模屠杀贪官。

应该说，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对反腐败问题还是十分重视的，甚至将其提到了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并为此专门成立了反贪局，另外还有法院、检察院、纪检委等机构也参与反腐斗争。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大，抓的人也越来越多可成效仍然不显著。贪官越来越多，由个案变成窝案，再变成串案，由秘密作案变成半公开，作案金额由几十万变成几十亿，大有燎原之势。

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下了这么大的工夫，腐败反而愈加猛烈？是什么原因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了腐败生长的沃土？有人说是商品经济的冲击和侵蚀。无疑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只是外因。同样是中国领土的香港地区，其商品经济远比大陆地区发达，为什么官员腐败的问题要好很多？归根结底是我们没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没有把监督权和任免权交给人民。当一位官员只须对其某位上级负责时，其下属的群众就只能是任其宰割的奴隶，还谈得上什么监督。民主，只有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腐败。这是唯一的选择！

第三章 苦难的民主之路

-- 百年之梦

提起民主，有些人认为，这是近十几年来的事。其实这是很大的误会。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民族一直在苦苦探寻民主之路，并因为没有社会民主而历尽了曲折，受尽了苦难。

早在上个世纪初，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已经建立了中国第一届民主政府，提出了著名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孙中山先生写得很清楚，“民权，秘谓‘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即民

主)，"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由於处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这种民主尚处于雏形阶段，集权的成份仍然很大。可惜不幸孙先生未能统一全国，真正实行其民主思想，便英年早逝，令人捶胸长哭。

中国实行民主的第二次天赐良机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双方始终各怀心思。外敌当前，还要边合作边撕打，一旦外敌不存，便要关起门来打个你死我活。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主，主，两位深受几千年帝王思想浸润的盖世英雄那管什么民主不民主，打得头破血流，也要决出个胜负来。令人可叹、可恨、可憎。如此英雄，有害国家，有害民族，不如不英雄！（但我们也不能过份苛责前人，也许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吧，也许是命运捉论人。逝者已往，来者可追，愿两岸携手，共同努力，不要让悲剧重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共产党也一直在探索一党专政条件下实现民主的途径。这种努力共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前，主要以争取和建立党内民主集中制为主。但这种民主集中制，民主只是名义和手段，集中才是目的和实质。

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无疑，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大浩劫，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认真客观的分析，就不能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试图在一党专政条件下反对官僚主义、实现人民民主的富有哲学意义的大胆实践。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人民享有最多民主权利的一段时光。普通的工人农民被吸收到各阶层的领导机构中。虽然选拔的方式并非完全民主，选拔上来的人往往素质较低，出现了不少问题，甚至闹了许多笑话，但让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反对官僚主义的意图十分显见。看一看现在干部贪污腐败的情况，无论其性质还是规模，都远非当年的官僚主义可比。再看看目前国家出现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普通群众怀念毛泽东时代，也不难理解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和思路。文化大革命并非因为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两种不同思路之间的较量。现在看来，毛泽东当年的思路并非全错，其担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第三阶段是邓小平时代。深受党内专断制度之害，前後两次几乎被开除出党的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呼吁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建立和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主的党内集体决策制度。甚至一度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由於"六四"事件的发生，改革被迫中断。实际上，即使没有"六四"事件，这种改革也仅仅是简单的修修补补，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突破。因为每个人的认识总是有

一定的局限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所说：“我同毛泽东同志是同一代人”。因此，这一时期仅仅是把党的领导制度恢复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

第四阶段是第三代领导人时代。客观地讲，这一时期是有所作为、有所突破的一阶段。尤其是在农村基层实行的民主选举制度，即村长选举，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这次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毕竟走出了第一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党内有一批有思想、有魄力的杰出人物，在孜孜不倦地探求著中国的民主之路。我在此向他们鞠躬致敬！

第四章 专制制度 -- 苦难之源

综观这五十多年，可以说，中国的民主之路实在是太曲折、太艰辛。尽管经过了漫长的时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始终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民主制度。尤其在毛泽东时代，权力过度集中的情况更为严重。毛泽东几乎集党的领导、政治伟人、精神领袖于一身。其所拥有的政治势能（注①）远大於古代皇帝。因为毛泽东作为一代精神领袖，其个人威望指数是古代皇帝望尘莫及的。

由於缺乏民主，领导人独断专行，任意作为，致使国家经济几度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

由於缺乏民主，国家主席刘少奇，共和国元帅彭德怀、贺龙，党和国家领导人陶铸、罗瑞卿等被迫害含冤而死。大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党内干部及普通群众遭受残酷打击、甚至疯狂屠杀。

由於没有民主，人民无法对干部进行监督和任免，使得腐败以骇人的速度大量孳生，不仅侵吞了相当部份的国民产值，严重影响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效率，而且已使得共产党蜕化变质。如再不动大手术，共产党将堕落为官僚资本家的政党，成为令当年的国民党也自叹不如甚至不齿的腐败党，最终成为官僚资本镇压人民的工具，成为人民的敌人，成为当年的共产党革命的对象。

由於缺乏民主，没有科学的、具有及时反馈机制的决策制度，我们总是不停地出现大的决策失误。短短五十年，我们经过的惊涛骇浪屈指难数。除了八十年代有过一段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外，几乎没有哪十年是一帆风顺地过来的。仔细研究一下

这五十年的发展周期，就会发现，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总是这样的：错误决策导致出现问题 - 问题逐渐积累 - 矛盾激化後发现错误 - 纠正错误 - 稳定发展 - 又犯新错误。正应了那句貌似富有哲理实则荒谬的老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於是没有失败便没有成功，每一次的成功都要以至少一次的长期的惨痛的失败为母，可谓不撞南墙不回头。其实失败并不能带来成功，成功也不一定以失败为前提条件。以学生们平时考试为例，多数学生都可以一次通过，并不需要每门考试先失败一次，然後才能通过。只有非常差的学生需要经常补考。还有少数学生补考多次都不能通过。如果一种决策体制导致不断地出现大的失误，只能说明这种决策体制是一个失败之母，邪恶之母，而非成功之母，需要彻底废除它，而不是修补它。但遗憾的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需要换一种全新的决策体制。每当出现大的决策失误後，不是想办法进行制度上的弃旧迎新，而只是将错误反其道而纠正之，然後对政策进行一些简单的修修补补，再找几个替罪羊。更可气的是，还不忘自我表扬自己还是英明的，还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错误总是难免的嘛。聪明人很少犯错误经常犯错误的人不能说是聪明，更谈不上英明。这个貌似富有哲理的错误难免论也是荒谬的。诚然，一个人一生总是难免要犯错误，关键是犯错误的几率有多大，是百分之一，还是百分之百。难免是指犯错误的几率不能为零，但不为零并不等於就是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百。因此，错误难免论是狡辩，是阿 Q 精神，不能成为经常犯错误的借口，更不能成为保持旧决策体制的借口。

由於没有民主，几十年来，实际上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完全系于最高领导人个人的品德和才能。如果不幸一位无德无能的人窃居高位，那只能是国家蒙难，人民受苦，而没有任何办法来加以改变。即使有幸遇上了一位英明如邓小平的领导人在受惠于其优点的同时，也必须自始至终接受其全部缺点，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如“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一些话，本来只是小平同志的口头语，或是在某种特定场合的讲话，居然被当成真理大加宣传。於是就被发展成“不管合法非法，挣到钱就是好法”，“不管好人坏人，挣到钱就是能人”。再如承包制，本来是一种只适合于农业这样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经济部门的经营方式，居然不经过可靠的论证、试验就在城市的工商企业全面推广套用，致使大多数国有企业在短短数年间就被化公为私、挖空吃尽。企业的承包制是一种非常错误、非常反动的管理方式，它使得党的企业组织陷於瘫痪，使得企业和职工原有的一点民主权利也被剥夺殆尽。

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地总结五十年来的艰难历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迄今为止，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一切苦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责任要归咎于这个要命的制度。这是一个令同志相害、兄弟相残、萁豆相煎的制度，一只让整个国家深陷旋涡而不能自拔的看不见的黑手，一个让人人发疯、人害人、人恨人、人吃人的魔鬼的咒语。不仅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罗瑞卿等人是受害者，如果抛开

具体事件细节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林彪、江青、高岗等人也是受害者。想想那时候人真是可怜，一个国家主席、共和国元帅、上将的命还不如一根稻草、一只麻雀，更何况普通百姓呢？我曾经看过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儿子刘源回忆他父亲的一个电视节目，在这个节目里，刘源已经初步从制度上对他父亲的遭遇进行了理性的反思。我想一定有很多象刘源这样父母受到残酷迫害的人也对父辈们的遭遇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不知他们是否抛开个人的恩怨，从更广、更高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思考。如果真是那样，我想他们父母九泉有知，一定会倍感欣慰。

讲完了过去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看目前的情况。在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第二代领导人的领导之下，基本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政治体制，尽量避免个人崇拜，适当分散了领导权力，打破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较为宽松开明的政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上台後，试行了农村基层的选举制度，人大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加强。应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三千里。因为宏观的政治制度和决策体制仍然没有大的变化。在国家层次上仍然实行的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在党内则继续实行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领导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政治势能，特别是当一个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时候，他所拥有的政治势能大得惊人。没有任何人能够限制他，他完全可以任意作为。在人类进入新的千年、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实行了两三百年民主制度时，我们却还在实行著一套类似几千年前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党专制制度，整个国家和十三亿人民的命运仍然悬于一人之手。

可以断言，如果我们不从制度上彻底弃旧迎新，还会有大的政治动荡发生，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罗瑞卿，如果上天还能给我们一段相对和平的时光，让我们从容地进行这种动荡的话。但只恐怕我们已没有这样的时间。如果不尽快解决矛盾，等待我们的将很可能不是政治动荡，而是国家分裂和长期的战争。一旦战事发端，将会有数以亿计的人悲惨地死亡，国家将四分五裂，各国势力的介入将不可避免，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恐怕还不如鸦片战争的时候。谁能保证中国还能再度统一，谁又能保证核武器不会落入战争各方，打红眼的各方不使用核武器呢，又有谁能保证核武器及其制造技术不落入恐怖组织和激进的中小国家？因此，中国的稳定不仅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安全。前苏联解体时，各个独立後的国家之间能够和平相处，乌克兰等国的核武器能够妥善地得到处理，不能不说是一次奇迹。如果中国发生同样的情况，奇迹还会发生吗？如果人类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偶然的幸运和奇迹之上，无异于把命运交给了死亡。我们不能再等待，我们已没有时间，我们已没有退路，我们已无可选择，我们必须变革，我们必须实现民主。任何麻木不仁、自欺欺人和无所作为都是犯罪，不仅是中国的罪人，而且是整个人类的罪人！！

在此，我向所有真正信仰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公正的人们，向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向那些本人和父母、亲友在历届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人们，向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特别是那些下岗失业人员，向海内外热爱祖国的人们大声呼吁，让我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为实现中国的社会公正、民主自由和经济发展而共同努力。同时我也要向全世界主张正义、热爱自由和和平的国家和人们大声呼吁，为中国实现民主尽可能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予帮助、提供一个友好宽松的国际环境。

最後，我还要向军队的同志们讲两句。在当前非常敏感的情况下，军队的同志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人民乃国家之根本，民主乃天下大势。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千万不能糊涂。军队永远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没有任何人、任何集团、任何政党、任何政府有权命令军队向人民开枪。谁如果敢下这样的命令，军队就有权把枪口指向谁。"六四"事件是有著光荣传统的人民军队的耻辱，也是党和政府的耻辱。这是上个世纪除段其瑞政府镇压学生事件外第二次向学生和民众开枪甚至动用坦克的事件。这种事蒋介石时代没有发生过，毛泽东时代没有发生过，甚至所谓"四人帮"时代镇压天安门事件时也没有发生过。如果说"六四"事件的发生有复杂而敏感的国际背景，当时党和政府以及军队没有处理类似事件的经验，民主意识还是空白，学生们也没有经验、比较幼稚，各方都有责任的话，今後决不允许再发生类似事件。谁如果敢下令开枪，谁就是国家的敌人、人民和历史的罪人，一定要受到法律、正义和历史的审判。其实动脑筋想一想，今天动用西北的军队镇压东北人民，明天动用东北的军队镇压华南人民，再後天呢，可能动用华南的军队镇压西南，用西南的军队镇压西北，这不是易父而杀、易子而射，交换亲人互相屠杀吗？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一位军长，因在"六四"时拒绝向人民开枪而被捕。我要在此向他致敬！他是国家的英雄，人民真正的儿子，人民军队的骄傲！！！！

第五章 一党制与民主

民主，简而言之，是人民主权，人民做主，人民对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一党制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对国家的最高统治权，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也是与现代商品经济的要求和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

第一，党内民主的提法是不准确的。民主的主体是人民，而党内民主的主体是党员。所谓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党员对党内事务的最高管理权，故应称为党员主权当然，如果把民主定义扩展为一种经过磋商、讨论、表决而做出决定的决策方式，党内民主的提法也是可以的。

第二，以往所讲的党内民主主要是所谓的民主集中制，这仅仅是民主的多数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具体应用。而民主除了多数原则外，还有一条补充原则，即保护少数原则。多数不得利用获得的权力，独断专行，将少数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更不能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对方；少数有权参与以后的竞争，并在竞争中与原多数派处于平等的地位，表述、宣传自己的观点。

第三，一党专政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相违背的。在一个人民共和国里，人民是天经地义的主人。作为主人的人民，有权决定谁来做管家，替自己管理家庭事务。这个管家就是政府。一句话，人民是主人，是所有者，政府是管家，是仆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而不是天赋神授，更不能来自于自封。不是你说你代表人民，你就代表人民，而是人民说了算。不是政府决定人民的命运，而是人民决定政府的命运。否则，就不是人民的政府，而是政府的政府，或者是党的政府。说得刻薄一点建国几十年来，我们执政的法律根据是不牢固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人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授权共产党组建政府，并且是永久性地享有。实际上，这种权力来自于自封，说得更确切一点，来自于强力，即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非人民手里出政权。另外，按照法律规定，任何政党和团体都应该在主管部门进行登记注册方为合法。我甚至怀疑，建国以来，我们党是否曾履行过登记注册手续。

第四，一党专政是与现代商品社会的要求相违背的。在现代商品社会里，政府不过是做为整个社会的一个成员，为全社会、为全体人民提供一种服务，即公共商品。顾客有权选择商品供应者。否则如果只有一个商品供应者，那就是垄断，而垄断是现代商品社会所不允许的，因为垄断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一党执政是政治领域的垄断，只会损害人民的利益。

第五，一党专政是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综观世界各国，不难发现，经济制度同政治制度之间存在著很大的相似性。高效、多元、竞争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求有一个高效、多元、竞争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否则，如果政治制度落后于经济制度，就会制约甚至阻碍经济的发展，使社会成为一个畸形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时间越长，速度越快差距就越大，问题就越多。

第六，实践证明，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我们上下求索、苦苦探索了整整五十三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仍然远未成功。其根本原因在於，我们迄今为止追求的民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一党专制条件下的民主。这是一个误区，一个极大的误区。毛泽东没有解决这个难题，邓小平未能解决这个难题，循著这个思路，后来的领导人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难题。因为这本身就是一道永远无解的题，是一条死路，是绝路。要真正实现社会民主，就必须站在比前人更高的高度，换一个思路，换一个角度。

第七，实践和理论分析证明，没有一个民主的社会环境做为保障，党内民主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党内个人或团体之间对重大问题有严重分歧时，只有三种可能的出路，一种是隐瞒自己的观点，尽量不发表不同的意见，紧跟形势，明哲保身，许多党员干部采用的就是这样的办法。其结果是大家慢慢地都不再独立思考，整个党基本上丧失了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党内很难听到不同的意见，要徵求点意见还一定要先保证实行“三不主义”——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即使这样，大家还得提防“秋後算帐”和“引蛇出洞”。第二种出路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甚至成为恶人的帮凶，陷害好人，落井下石，自己则不择手段往上爬。阴谋家和投机家采取的一般是这种策略。只所以采用这种策略，部份人是为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多数人则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已而为之。第三种出路是因性格的原因和所处的地位而不能选择前两种出路，又不能同对方达成妥协或共识。典型的情况是派系斗争或路线斗争。结果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失败的一方轻则受到党纪、政纪、法纪（不一定是法律）的严惩或遭软禁。这是邓小平、杨尚昆、华国锋、赵紫阳等人的遭遇，其实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情况也可归入此类。重则死路一条，即自杀、被迫害致死、饿死，这分别是罗瑞卿、彭德怀和刘少奇及陶铸、贺龙等人的遭遇（每次写到这几个人心里总是很难过，真不愿一遍又一遍地写，尤其是这样写，可是为了把问题说清楚，不得不如此，请大家原谅）。当然死路一条的人也有一条出路，逃亡出国。这是林彪的选择。既是没有活路，被逼逃命，除非出去後做了叛国之事否则不能定为叛国，因此，对林彪元帅应该重新予以公正客观的评价，不能因为反对某一个人（即使要谋杀某个人），就给他定上反党、反人民、叛国的罪名，也不能把毛泽东应该承担的责任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必须对这一段历史彻底解禁，还历史之本来。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如果某一团体或个人在党内竞争中失利，反而会全力支持获胜的一方继续参加更高层次的竞争。如果同胜利一方的分歧不可调和，则可以退党、加入别的党派、甚至另行组党。党派之间，竞争获胜的一方虽然主持政府，却还要受到舆论和选民的监督，并且要经常被反对党百般挑剔，而失败的一方则可以悠闲自在地做反对党，想办法扒执政党的皮。没有任何人会因发表反对意见受到任何形式的制裁，更不会有任何人身危险。由於没有後顾之忧，在党内的竞争中，各种观点都会得到充份的表达、辩论和宣传，反而保障和促进了党内的民主。可以想象，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就不会有几十万右派和几百万政治犯，更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于政治原因。想必不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罗瑞卿等人，还是林彪、江青、高岗等人，都一定做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享有很高的声望，说不定他们中有些人之间关系还不错呢（请原谅这种假设，但如果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由於没有民主，本应该在民主国家内政党之间、各政党内团体之间出现的和平竞争便在唯一的执政党 - 共产党内以派系斗争这种类民主的形式出现。而且这种派系和派系斗争的存在还是最高领导人所默认甚至参与的。大家都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跟一派斗完後，还得接著同另一派斗。诚可谓生命不息、斗争不止。甚至许多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知心朋友最後也反目成仇、互相残杀。这种斗争甚至比起封建社会的宫廷斗争还要残酷得多，规模更大。因为宫廷斗争的主角是皇子，他们之间至少有血肉之情，还有老皇帝在中间调解，而党内斗争的各方则没有这种血缘关系，国家最高领导人自己又经常是这种斗争的主角。而且越是有理想有魄力、为国家和人民负责的领导人，在斗争时越坚决、越奋不顾身，因而越残酷。

第六章 民主与社会主义

-- 并非冤家对头

关于中国到底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目前主要有两个完全对立的思想派别：一种是主张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传统社会主义派，简称传统派；另一种是主张完全模仿西方民主制的全面西化派。尽管这两派观点完全对立，却异曲同工，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将社会主义同现代民主制度对立起来。传统派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就只能由共产党执政，如果其他党派执政，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全面西化派则认为，实行民主制当然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民主只是一种国家的管理方式，并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正如同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一样。社会主义不但不排斥民主，而且需要民主做为其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是僵化的社会主义，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则是专

断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人民不能当家做主，连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一党专制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一党专制与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更进一步讲，一党专制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既然社会主义不排斥民主，为什么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质上都没有建立民主制度。下面我从思维误区、传统习惯、发展历史、国际环境四个方面来讲一讲这个问题。

一、思维误区.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主张社会主义,故只有共产党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代表,只有共产党才能执政。

二、传统习惯. 许多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实行社会主义的主要是一些的封建专制时间比较长的国家。大家都知道，质量越大的东西惯性越大。一个乒乓球转一圈可能要半秒钟，而地球转一圈要二十四小时。历史发展也有惯性。一个国家越大，封建的历史越长，转变就越慢。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那些封建历史比较长的国家，其人民没有民主的意识，已经习惯了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而社会主义由於逻辑思维和发展环境的原因，主张高度集权的一党制，比较适合这些国家人们的习惯。

三、发展历史 . 除了在苏联庇护下建立起来的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外，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有著长期的丰富的战争经验，十分熟悉军队的管理方式，而对管理国家几乎完全没有经验。因此这些国家的管理方式主要是军队管理方式的变形，加上该国传统的管理方式。

四、国际环境 .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後，由於两大阵营的对抗，始终处於战争的威胁之下，必须保持高度的集中和统一，因此，不可能有机会实行民主改革。在那种情况下实行民主无异于分散力量，自乱阵脚。尤其是中国，先後同美韩、苏联、印度、越南交恶，几乎四面受敌；内部又困难重重，党内有诸多派系，经常有意见分歧，即所谓路线斗争；还有一个台湾问题。能生存下来已是不易，哪敢去搞什么民主制。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实行民主制度，固然有主观思想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各方面的客观条件造成的，而非社会主义天然与民主相排斥。那种把社会主义同民主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实行民主制度完全归罪与共产党或某个领导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幼稚的、不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

在原苏联和华沙集团已解体、世界局势大大缓和的今天，中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原来激烈对抗的各国都建立了比较友好的关系；而新一代领导人无论是知识水平还是民主意识都较老一辈领导人大大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国门洞开，中外思想交流空前活跃，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可以说，建立民主制度，还社会主义本来面目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第七章 四种错误思想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仍然面临著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源于思想意识方面，具体说，主要来自于传统社会主义、全面西化思想、民主软弱论和经济文化落后论四种错误思想。其中前两种思想前面已经简单提到过，在这里再详细分析一下。

1. 传统社会主义思想。

持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是一些老同志，他们认为，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主张社会主义，因此只有共产党才能执政。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

首先，实践证明，一党制是一种危害极大的政治制度，它已经并且会继续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对此前面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述，在这里就不再重复。

其次，社会主义的核心和精髓是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正。但这只是实现了人们之间经济上的平等地位，却忽视了人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即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实际上，如果人民没有民主权利，不能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那些手握大权的人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逐渐剥夺人民原先享有的经济上的平等地位，社会主义最后就会有名无实。不但不会保证人民经济上的平等地位，反而会成为助长两极分化，助长剥削的工具，这正是当前中国的现实。因此，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而且应该成为与社会公正并列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

再次，经过近百年的实践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已广为人知。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已不仅仅限于党内人士，很多党外人士也主张社会主义，他们甚至比绝大多数党内人士还要共产党化，要不怎么最近连党报也惊呼，“党员不象党员”，可是党报却忽略了另一个现象，“很多非党员更象共产党”！我就认识很多人，他们赞成社

会主义，可就是不愿加入共产党，因为他们看不惯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千方百计捞党票、往上爬、以权谋私、极端腐败的做法，不耻与之为伍。如果这种党外人士另外组成一个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譬如说民主社会党或民主共产党，难道他们无权代表社会主义，无权执政？？？当然可以，毕竟共产党没有为社会主义申请专利！

最后，经济领域的左倾思想给国家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同样地，政治领域的左倾思想则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已经并且将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灾难。那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死抱着一党制不放的思想，是政治领域的左倾主义、教条主义。

令人惊奇的是，持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还有许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他们吃了亏、受了迫害，却只是从个人恩怨的角度去认识问题，而不能从更高的角度对问题的根本原因进行彻底的反思。难道他们还想再当一次右派、再坐一次牢？如果他们自己愿意，那他们自己再去当右派、去坐牢好了。我们年轻一代可不愿意。

在此我向这些同志们呼吁，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思想必须跟上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今日之共产党也非昔日之共产党。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地想一想你们当年的理想和追求，再抽空去做些调查，了解一下当前中国的现实，看看当今之中国，是否符合当年你们的理想。

2. 全面西化思想。

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一样有害的是全面西化思想。持这种思想的人主要是“六四”後逃亡海外的部份青年学生。这些年，这些学生们在国外吃了些苦，经受了些锻炼，一部份人成熟了，他们对“六四”事件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认识到了学生们自身的不足和在“六四”中的不成熟。另外一部份人则变得更加幼稚，更加激进，他们也许是优秀的自然科学家或工程技术人员，但他们实在不懂政治，也不了解中国的情况，问题是他们偏又特别关心政治。当然他们热爱祖国，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精神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还有极少数人走得更远，更极端，他们不顾中国的现实情况，极力鼓吹照搬西方多党民主制，仇视社会主义，仇视共产党，甚至鼓动国外势力制裁中国。他们

把中国没有民主完全归罪与社会主义制度，归罪与共产党。这种思想是简单的、片面的、错误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多党制并不适合中国（对此已有很多论述文章，因此，下面我只简单地讲一下，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这方面的文章看一下）。

首先，多党民主制有很多弊病。主要表现在黑金政治和低效政治。几乎所有的多党民主制国家都无可避免地存在著一桩接一桩的政治献金丑闻；各政党之间没完没了的合纵联横，频繁政府更迭；各政党把拉选票而不是把国家和民众利益放在首位，无穷无尽的政治扯皮，经常影响了具体问题的解决，即所谓的“民主病”。以美国为例，每年因枪杀而死的人数超过了因交通事故而死的人数，可是到现在，居然没有一届美国政府能够解决私人持枪的问题。

其次，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多民族、人口众多的国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处於非常关键的经济和政治转变时期，有许多尖锐的矛盾和棘手的国内问题需要解决，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高效率的政府。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也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最後，在中国和平实现民主离不开共产党。在此，我必须强调一下，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共产党肩负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迄今为止经历过的一切苦难，一党专制这种非民主的政治制度要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责任：而一党制与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毫无关系的概念，社会主义不但不排斥民主，而且非常渴望民主，甚至可以说，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注定要走下坡路，最终被历史无情地扫地出门：我们之所以一直没能建立民主制度，固然有领导人和共产党自身的主观原因，但更主要是由於所处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如果我们将我们曾遇到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分离开来，单独地考察一下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基本思想，就会发现，这些思想是非常好的。因此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曾经犯过错误，就连一些不应为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好的东西都否认掉。要知道，这些好东西是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必须珍惜它。否则，等发现矫枉过正之後再来矫正，恐怕就为时已晚了。其实看一看在东德、匈牙利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或以共产党为前身的政党卷土重来、再次受欢迎的情况就不难明白这一点。既有前车之鉴，我们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再走弯路？那种想把共产党排斥在民主大门之外的思想是极其幼稚、极其错误的，只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3. 民主软弱论。

大家应该注意到，我在上面一段第一句话加了和平两个字，并且用了黑体带下划线。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是为了防止党内的同志们产生错觉。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错误认识，既然民主离不开共产党，那就是说民主是个软弱无力的可怜虫了，民主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是否实行民主，什么时候实行民主，完全由我们说了算，即使我们不实行民主，民主也没办法。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对这种想法我不想也不值得费太多的笔墨和时间，只想引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中写的一段话，“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水流的方向或都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倒行逆施，无论力量是怎么样大，纵然一时侥幸成功，将来一定是失败，并且永远不能再恢复。”（《三民主义》数字版见 www.china1840-1949.com/data/2000/sunyatsen）

由此可见，民主乃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民意而行民主，则造福百姓，国兴家兴天下兴，创千年之伟业，留万载之英名。反之则祸害百姓，亡党亡国亡家，留千载之骂名，遭万民之唾弃。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功罪、成败、兴亡、祸福、战争与和平，全在一念之间。希望党内和军内的同志们特别是领导同志们，在民主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千万不敢糊涂啊。

4. 经济文化落后论。

这是一个荒唐甚至弱智的观点。但考虑到该论毒害较深、流毒甚广，决定还是引用几段话来说明一下。“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国家大、人口多、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低，所以不宜扩大直接选举，提高选举的民主程度。条件不具备，贸然去搞民主会把社会搞乱。这种‘经济文化落后论’被视为中国国情，一直为很多人固守”（见《选举在中国》一文，作者蔡定剑就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载《南风窗》）。其实这种思想也不是什么新货色，早在上个世纪初，就曾为袁世凯“陛下”所推崇，作为其复辟帝制的理论基础。“有人说，中国人民的程度太低，不适宜于民权。美国本来是民权的国家，但是在袁世凯要做皇帝的时候，也有一位大学教授叫做古德诺，到中国来主张君权，说中国人民的思想不发达，文化赶不上欧美，所以不宜用民权。袁世凯便利用他这种言论，推翻民国，自己称皇帝”（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第一讲）。没想到过了近一个世纪，这种谬论阴魂不散，又死灰复燃，为某些人津津乐道，真让人可笑、可叹、可气、可怒。“‘经济文化落后论’今天还是中国的现实吗？中国到底能不能扩大直接选举，提高民主程度？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两年来在全国近 20 个点进行了广泛调查”（蔡定剑），调查结果分析证明，“一个正常的市民社会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只有选举行为与自

己的利益相关时，才会积极投票。如果把选举制度建立在公民的教育程度、政治觉悟基础上，你就很难理解西方一些国家 200 年前就开始议会直选。难道说 200 多年前那些流亡、放逐到北美大陆的异教徒、罪犯和流浪者比今天我们经过 50 年先进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国公民的政治觉悟还要高吗？他们在 200 年前直选了国会议员，难道 21 世纪的中国人民只能选举村长吗？所以，以公民素质高低来解释选举制度的推行是很荒谬的。”（蔡定剑）

不过请注意，“经济文化落后论”错误并不一定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直接将农村的选举方式简单地扩大到更高甚至中央层次就是对的。如果是那样，我们又会犯将承包制简单地由农村推广到城市同样的错误。无疑，农村的选举是一项很大的进步和突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但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要不为什么“全国许多地方涌动愤怒的农民联名要求罢免不合法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和腐败干部”（蔡定剑）。农村民主选举的设计者、倡导者和决策者肯定不会希望选举仅仅停留在村级水平上，他们比谁都希望试验能取得成功，然后在更高层次上推广。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很明显，试验的结果并不理想。不过，幸亏没有象很多民主国家和国内外民主人士所希望的那样，在更高的层次上推广这种选举，否则，带来的混乱可能会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政党参与竞选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对各种力量进行整合和组织，使选举变得有序化。没有两个以上政党参与的选举是没有核心组织的原始的混乱的选举，如果这种选举在规模很小的村级选举上仍以凑合（尽管有很多问题）的话，在更高的层次如县乡级以上层次则会是灾难性的，将会产生几万甚至几十万个大大小小的地上或地下的团体和准政党。

第八章 新民主社会主义

-- 唯一的选择

讲到这里，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感到很迷茫，一党制你也反对，多党制你也反对，好不容易搞了个村级选举，你还认为不完善，那你到底要什么？除了这两种制度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制度？有！那就是新民主社会主义。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既结合了社会主义和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优点，又能避免其缺点的新的社会制度。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人民将从名义上的主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同时这也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将逐步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并尽可能地限制大的经济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干预，使全体人民能够尽可能直接地参与国家的管理和决策。

新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是：

1.继续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的构成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产阶级已基本消亡，而工人农民的概念并不能包括整个劳动者阶层，劳动者同资本阶层的矛盾也已不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可以通过工会和国家进行协调、控制的内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泛泛地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等空洞的概念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适当改进。

新民主社会主义中所讲的社会主义的应该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点强调公正、平等、和谐三个方面。

关于公正我主要从四个方面简单地讲一下。首先是经济公正。要通过收入所得税、遗产税、救济金等再分配的手段以及不同的社会费用（养老保险、疾病保险等）征收比例来较大幅度地调节各阶层的收入，尽可能地降低贫富差距，改变目前杀贫济富的状况；真正减轻农民和下岗失业职工的负担；增加发展性扶贫资金；大幅度提高助学金，消灭贫困家庭的学生上不起学，甚至考上大学也上不起的现象。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这叫什么社会主义。其次是信息公正。建立贫困落后地区的电子信息网络，使得现代农业技术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及其他经济信息也能到达落后地区。最后是法制公正。包括立法公正、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公正是法制的生命。不公正的法制是魔鬼的利器。不公正的社会是邪恶的、被打断了脊梁的社会，是邪恶者的天堂，良善者的地狱。因此要毫不留情地、不惜一切代价地彻底肃清法制部门严重的腐败现象。

平等除了政治地位的平等外，重点是经济地位的平等。除了要在城市恢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外，也要逐渐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有些地方和行业还存在著封建式的残酷剥削现象，对此要依法进行坚决打击。为保障职工的利益，要赋予工会以独立的地位。

和谐是一个包含范围很广的概念。包括各阶层、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为了创造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我们有必要放弃目前盲目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的做法，而参考联合国等机构的指标体系，创造一种新的指标体系。这种指标体系应该反映一国居民生活和谐幸福的程度，姑且称之为和谐指

标。制订和谐指标时应该考虑，人均实际收入、物价指标（实际购买力）；工作时间、交通时间、休闲时间、劳动强度、工作压力；政府支出占国民净收入的比例、政府工作效率、政府官员廉洁度；空气污染度、森林覆盖率、其他环境指标；健康卫生指标、人均寿命、百人医生数、医疗保险覆盖率；养老保险覆盖率、经济增长率、经济利用率；贫富差距指数、社会收入分配指数；失业率、犯罪率、吸毒人员比例、社会治安指数、司法廉洁度、司法效率；社会公正度、人际关系和谐度、民族关系和谐度；假货比例、社会廉洁度、行业道德、公民道德；文化娱乐度、人均受教育程度、再教育率、专业教育利用率（毕业学生从事原专业的比例）；人身自由度、宗教自由度、言论自由度、政治民主度。当然还有很多其它指标，希望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和机构能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据此对当前中国的社会现状做出评价。每个人也可以从这些方面对自己生活的质量和社会的现状做一个大概评估。

我最後再强调一遍，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社会主义。这是根本路线问题，不允许有任何动摇。八九年柏林墙倒掉後，原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土崩瓦解，绝大多数共产党一哄而散。国内也随之产生了一种全面资本主义化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胜利，社会主义必然灭亡，中国必须政治上实行多党议会选举民主制，经济上全面私有化，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这种思想不仅是许多所谓民主人士铁的信条在许多普通群众甚至党员干部和失业下岗人员中也很有市场。这种想法是十分幼稚的，因而是十分有害的。

关于多党民主制，已经有很多论述文章，前面我也简单地讲了一下。在此就不再重复。下面我重点从经济方面讲一下。

首先，综观世界各国，纯粹的资本主义已不存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相当比例的公有经济成份，国家对经济起著很强的调节和控制作用。尤其在西欧和北欧的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生病有医疗保险，失业有失业保险，退休有养老保险，收入高者多交税、多做贡献，收入低者则可以享受各种福利、补贴和救济。相比之下，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医疗保险体系几近崩溃，众多失业下岗人员生活无著，许多退休人员生活、医疗没有保障。可见，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保障和经济公正方面，比我们国家还要社会主义化。

其次，实行社会主义是社会和谐和公正的要求，更是社会良心的要求。我们决不能抛弃我们的人民，决不允许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化公为私，一夜暴富之後，再摇身一变，成为权贵资本家，垄断经济，鱼肉百姓，残酷剥夺排挤其他合法经营者。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既竞争、又协作，富有活力，和谐发展，充满爱心的幸

福社会，而不是一个无限竞争，利欲熏心，极端自私，人坑人，人害人，甚至人吃人，人杀人的人间地狱。我们既要保护富者合法所得的私有财产，鼓励个人创业致富。但也要控制贫富差距，保护贫者和弱者。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要偏向贫者和弱者，因为富人本身是社会的强者，没有必要再对他们进行额外的保护。

再次，实践证明，全面资本主义化是一条苦难之路。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後，整个社会政局混乱，原有的经济体系全面崩溃，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人民生活大幅下降，多数国家人民的生活甚至用悲惨两个字来形容也不为过。原东德属於前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东西德统一後，东德从西德得到了几千亿马克的经济支助，众多西德企业在东德大量投资，尽管如此，东德经济持续萧条，十三年後的今天，东德的失业率已超过 20%。再看看我们国家的情况，九十年代以来，除了在名义上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外，政治上有走向更保守、更腐败、更专制的新保守封建主义的倾向，经济上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也有走向圈地运动时期的野蛮资本主义的倾向。没有学到现代文明资本主义的优点却已全面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优点。这种野蛮资本主义化倾向开始仅仅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产生了四千多万的失业下岗职工，加上各种隐性失业（如企业内部下岗）人员，实际城镇失业人员达四、五千万，再加上停业破产企业无人关心的退休职工城镇绝对贫困人口已超过一亿人。可以说，在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悲剧，已经在中国上演，而且序幕才刚刚拉开。如果任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可以断言，人民的处境要比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悲惨得多。野蛮资本主义是一条通向地狱之路我们宁肯再次举起红旗，扛起枪，决战中原，也决不答应野蛮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继续。

2. 坚持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相对领导地位。

做为一个拥有五千万党员的超级大党，共产党的存在是中国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是中国稳定和连续的需要，也是和平实现民主的需要。那些盲目仇恨共产党把共产党同民主对立起来，试图打著民主的旗号打倒共产党的人，被仇恨蒙住了眼睛，丧失了理智，失去了思想，最後变成了歇斯底里的极端主义分子。他们的行为，有害于民主，有害于中国，他们终将一事无成。恳望这些人能迷途知返。

坚持共产党的相对领导地位，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会实行社会主义。

不过请注意，坚持共产党的相对领导地位，只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而非充份条件。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保证其性质不变，取决于共产党自身的性质是否改变。最近党内有一种将共产党逐渐改造成全民党的倾向。前两年，我也有过这种想法。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首先，由於利益分配的不同和思想的差别，人民内部份成许多不同的团体和阶层，他们的利益往往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互相冲突，因此，一个政党不可能代表所有的团体和阶层，只能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如果试图代表所有的阶层和团体，其结果可能乃个团体都不能代表。

其次，广大的工人、农民迄今为止始终占整个人口的绝大多数，谁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谁就能在竞争中赢得胜利。因此，各个政党都会首先力争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农代表自尊的共产党无论从竞争策略、还是从社会良心、历史缘源上来讲，都应该当仁不让地力争继续做工人、农民、特别是其中弱势群体的代表。我们决不能背弃工人、农民！因为我们背弃他们之时，就是他们抛弃我们之时，也是我们灭亡之时。

再次，由於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职业人口的结构在不断地变化。工人、农民的人数和比例在不断地下降，在多数发达国家，甚至降到四分之一以下。因此及时将工作重心由工人、农民扩展到以工人、农民、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文化教育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为成员的整个劳动者阶层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关于资本家入党的问题。这本来并不是一个什么重要问题。直到一九五六年“八大”以前，共产党从来没有拒绝过资本家入党；而且从成立至今，共产党一直有很多资本家朋友，称做“红色资本家”；自八十年代以来，又有不少共产党员，白手起家，独立创业，已成企业家，雇佣很多工作人员，他们不是资本家是什么，难道要把他们开除出党不成？甚至连共产党的鼻祖之一——恩格斯也是一位资本家，一位地地道道的大资本家。因此，允许资本家入党，是顺理成章、尽在情理之中的事。关键是以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如果仅仅是作为纠正历史错误的个案行为，允许少数资本家入党，则并无不可，标志著共产党更加成熟、更加开放，更加实事求是。如果是作为重大的历史性突破，大量吸收资本家入党，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因为这意味着共产党要彻底背弃广大劳动者、拜倒在资本阶层特别是权贵资本阶层脚下。从今以後，金钱将同权力赤裸裸地、合法地合二为一。许多贪官污吏可以摇身一变兼做资本家，使其非法收入合法化，而大批有後台的资本家则可名正言顺地走到前台，身兼要职。一党专制，已经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如果再加上经济

专制，其後果就不是双倍的专制，而是乘数效应的极端专制(注②)。广大的劳动者和小企业主们就只能沦为奴隶、任其宰割。

为了避免後一种情况的出现，建议党内对资本家入党的问题低调处理。对资本家入党要从质量上、数量上和比例上严格把关。毕竟同入党後成为资本家的人相比，成为资本家後再入党的人，其动机不良、政治投机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最後，关键的问题还是实行民主。如果不实行民主，只是简单地将共产党改造成全民党，其结果可能会很糟。共产党毕竟经历了几十年艰苦的革命岁月，有思想、有组织、有纪律，有著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光荣的传统，还有一大批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干部，绝大部份成员又是劳动者子弟。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思想、组织松懈、纪律涣散、鱼龙混杂、无所不包的政党一党专政会是什么样子。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必定是一个干好事几无所能、干坏事无所不能的无政府主义的大杂烩党。

3. 保持一定比例的公有经济成份。首先国家应控制关键的经济部门如电信、能源、军工、航天等。其次应对现有的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造，使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果有时间的话，对此我将会写专文论述）。

4. 在经济领域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大力支持鼓励私有企业发展。建立完整规范的经济法规；提高经济司法的透明度和执法效率；改革金融系统，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为私营企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透明性。要保证私营企业的合法性，保护私营企业主的合法财产和利益不受侵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连续有多名著名的企业家相继落马，而且这种趋势有上升趋势。这些企业家所在的企业，有些是公私合营，有些是挂靠在公有单位的私营企业，也有些原先是承包的小集体企业。落马的企业家中最为著名的有云南红塔集团的储时键，广东三水健力宝集团的李经纬。以储时键为例，他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且不论其性质）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千亿资产的超巨型企业，就是奖给他五十亿也不算多，退一步讲，十个亿总可以吧，结果不但不奖，还要为一千多万元的事把人家抓起来，搞得人家破人亡。真是岂有此理！这是政策逼人犯罪，是政策犯罪，是政府犯罪！这正验证了我前面所讲过的：如果没有民主，那些手握大权的政府官员和权贵资本家，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逐渐剥夺人民原先享有的经济上的平等地位，垄断经济，鱼肉百姓，残酷剥夺排挤其他合法经营者。他们可能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剥得干乾淨净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因此,我们应当改变那种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原始的均富观念,从宪法和法律上保证私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对产权不清的企业要合理界定其产权,该给企业家的就一定要给人家,该奖励的一定要奖励,不要犯眼红病。中国实现民主後,中国的经济将会飞速发展,世界首富肯定会在中国产生,他可能会有数倍于比尔·盖次的财富。这是好事,我们不但要予以保护,还要予以大力支持和鼓励。因为在他拥有大笔财富的同时,他也会创造大量的社会就业,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且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相当部份的财产还会以税收的方式上缴国库。这是多么好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愿我们的张瑞敏们,从此能直起腰来,不再战战兢兢!也希望储时健们,能早日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奖励!

5.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尤其是要大力改革教育制度,废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教育发展模式,摈弃目前这种不顾社会需要一味追求升学率、盲目培养学生的、科举制度式的、文凭印刷机式的、死板教条、摧残人才、毁灭创造力、学院式的教育体系。大大加强高级实用技术人才的培养,鼓励实用技术的发明创造。对於很多知识陈旧、学生学无所用、毕业後找不到工作的专业、系、科、院校,要相应减少经费、甚至关门。

大力提倡技术创业,特别是团队创业,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总之,要使整个社会形成学习、创造、创业的良性循环。要在教育学习、发明研究、专利申请、开业登记、资金支持等各个环节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要派出大量的实用技术人才出国留学。

6. 在政治领域实行民主化

具体设想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其他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有计划地逐步地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两党民主制。具体地讲,有七种方案:

一、将共产党分成两个党,一个称为民主共产党,另一个可保持共产党名称不变(当然也可取别的名称)。从而将党内的派系斗争转变成政党之间公开、公平、合法的竞争,将竞争引入政治领域。

二、由国内各民主党派一起筹建一个新的政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具体名称可协商确定，为简单起见，下面简称民主党），民主党成立后，各民主党派原有党员可根据情况申请自愿加入或全部并入，原民主党派全部解散。在筹建民主党的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完全在友好协商、平等竞争的基础上制订党章，确定人事安排自主决定各种事项，共产党方面不予以任何干涉。

三、这种方案是介于前两种方案之间的一种综合方案，只是为了加强共产党的力量，避免双方力量悬殊，同时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在组建新党的时候，可依个人自愿、协商决定的原则，由共产党派一部份人参与新党的组建，同时共产党亦可吸收民主党派人士。

四、这种方案是介于第一、二种方案之间的另一种综合方案，先实行第一种方案，等到条件成熟后，再由这两个共产党分别吸收其他民主党派。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民主。

五、这是一个过渡方案，在县乡级以下先逐步分阶段实行两党制，在地区以上继续实行一党制。以后根据情况再看。这种方案有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干部和政府的监督，解决目前基层社会尖锐的社会矛盾。

六、在乡村两级实行以两党为主干的实际上的多党**直接**选举制，但这里的多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派，而是各类社会团体。要鼓励各社会团体积极推荐候选人，参与民主选举；在地区和县级实行真正的两党**间接**选举制（即代表选举制，类似目前的人民代表制）；在中央和省级暂时继续实行一党制，以后根据情况再看。

这种民主制度将多党制、两党制和一党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也将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最佳效果。具体说有四个很重要的优点：

1. 这样有利于吸收多党制的优点，给社会的各个阶层、各团体都给予充分的民主权力，让所有的观点都有充分表达的机会，一方面集思广益，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矛盾。
2. 乡村多党直接选举涉及面比较小，很多人和事都比较直接，信息量不是很大，很容易作出选择，非常适合目前基层一般选民素质不是很高的实际情况。

3. 县级以上的实行的民主制度又避免了多党制的危害。

4. 这种民主制度同时也吸收了中国现行政协和人大民主制度的优点，同现行制度有很大的包容性。一方面，组建民主党，可直接利用现有的政协系统，另一方面间接选举又可以借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七、（略）

以上方案，第一、四方案实际上只是思考问题的一个角度，以退为进，为那些坚持一党制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开阔视野、转动脑筋的思路，也可以说是说服他们的谋略或辩论艺术，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因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不但决不能消弱，而且要加强。要严肃党纪，实行大清党，坚决把那些腐败分子和投机分子扫地出门，一定要再造共产党。

所以第二、三、五、六方案要比第一、四方案好一些，因为这几种方案既可以保持共产党的完整性，又可以利用现有的政协系统，比较容易实行。

二、三、五、六方案中，第六种方案可以说不但集中了前几种方案的优点，而且更有创新，最具有可操作性。当然最好的还是第七种方案。但在这里我不能讲。

总之，通过以上方案的实行，可以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建设引入新人才、新思想、新活力，还可以实现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的对话、协商、理解、谅解、协作、融合和发展（简单点，也可缩略为沟通、理解、协作和发展）。

第九章 民主前夜

为了为顺利实现民主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重塑共产党的形像，在正式实现民主统一以前，必须首先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不惜代价重整法纪。

目前大陆地区普遍社会治安严重恶化、黑社会猖獗、娼妓遍地、毒品泛滥、假货充斥市场，所有这一切丑恶现象的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黑後台，那就是政法公安部门存在的严重的腐败堕落现象。政法腐败是继政府官员腐败以外的另一大社会腐败现象，同政府官员的腐败相比，其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发指。民间流传"大沿帽（法官），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警匪一家"，虽不免太过，但也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

法制系统是一个国家的脊梁。一个法制系统腐败糜烂的社会是被打断了脊梁的社会，是邪恶者的天堂，良善者的地狱。因此要毫不留情地、不惜一切代价地彻底肃清法制部门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有必要，可以对法院和公安部门大换血，从律师中选拔部份人员担任法官，从军队、受害者及子女中选拔一些人进行培训，充实警察队伍。

二、痛下杀手，彻底解决政府官员的腐败。

官员的腐败发展到今天，已是冰冻三尺，极难消除。十几年来，虽然我们下了很大的力气，却无异于以水扑油火，愈扑愈烈。要一揽子彻底解决腐败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我们反腐败的目的不是抓人杀人以泄愤，为惩治而惩治，而主要是三个方面：1.顺应民意，匡扶正气。2.收回被非法侵吞的国有资产，为下一步改革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顺利实现民主筹集资金。避免大量资金转为黑色资金後，退出社会生产领域，甚至转移国外，造成社会生产资金不足，形成通货紧缩。3.最後才是以警後来，震慑潜在的罪犯。其次我们必须了解腐败产生的两种社会环境因素，一是没有政治民主，导致缺乏官员竞争制度，缺乏舆论监督和人民监督；导致政府权力过於集中，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程度过深、范围过大。二是错误的政策和舆论导向，有一段时期甚至发展到有些报纸和刊物公开主张允许犯有贪污受贿等经济罪行的企业家戴罪立功。有些地方检察院的有关人员为行贿保驾护航。

因此，腐败的大量产生，社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政府自身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如果我们把腐败产生的原因单纯地归根于犯罪者个人，就无法解释被动犯罪的情况：有许多本来很正直的领导干部，在恶劣的环境下，被迫随波逐流，参与犯罪。那种把责任完全推到犯罪者头上，抓杀了之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也不可能解决问题。鉴于牵涉的人数太多，面积太广，为了避免引起社会的不安和骚动，避免太多的个人和家庭悲剧，相对顺利平稳地处理好这个问题，政府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在实行民主前这一段特殊的时期，实行特殊的政策，给那些一时不慎，走上犯罪道路的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他们在一定的期限内，在专设机构主动承认自

己的罪行，并秘密退清赃款，可以不追究该项犯罪所可能带来的一切刑事、党纪责任，允许调动职务，不记档案，不予公开。对那些拒不自首、负隅顽抗、甚至妄想以自己一死为子女留财富的顽固分子，要毫不留情、坚决镇压，即使逃到天涯海角（指国外）也要把他们抓回来，抓不回来就就地正法。家属、子女、亲友窝藏赃款赃物者，于本人同罪，而且这种掠夺国家财物的罪行应当有无限的追溯期。

要同世界各国签定引渡经济罪犯、追缴赃款的引渡协议，对于不能达成协议的，可废除同该国的一切司法协议，并在很长（五十年）内终止同该国的一切司法协助，公布居住在该国的所有经济犯罪人的名单和情报资料，鼓励民间团体以一切方式追缴赃款。只有这样，才能双管齐下，最终解决问题。不但迫使逃亡海外的经济罪犯回头是岸，更重要的是切断国内经济罪犯的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迫使其不得不交代问题。

一个民主和平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公正，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能否达成引渡协议，切断国内经济罪犯的退路，直接影响到反腐败的成败，从而影响到能否为民主改革赢得足够的支持、创造良好的经济基础，一句话，直接影响到民主改革的成败。在此，我要向世界上那些希望中国实行民主的国家呼吁，尽可能快地同中国签定司法引渡协议。尤其是欧美日俄等当今世界大国，在种族主义盛行、军国主义至上的人类野兽时代（鸦片战争至冷战以前）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给中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心理创伤，在中国试图走向民主、回归世界大家庭的时候，应该给中国以尽可能的支持，至少是道义上的支持。那些不但不给予支持，甚至连一纸于己无害、于中国有益、最终也于己有益的协议也不愿签定的国家，是不友好的、虚伪的，至少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民主、发达、和平的中国。

三、客观评价“六四”事件。

对“六四”事件的严厉镇压，再次说明了专制制度的腐朽和老人政治的弊端。其后果一方面是中断了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的民主改革进程，另一方面则助长了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使他们认为，“反腐败看来是没戏唱了”，於是便在腐败的“金光大道”上‘大胆地往前走’。稍微观察一下，便不难发现，官员腐败实际上是在“六四”以后才开始发展，并逐渐进入超高速发展期，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以反腐败为目的的“六四”事件，是一次学生自发的请愿活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对“六四”事件的严厉镇压，实际上是对广大人民意愿的镇压，在人们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产生了很强的逆反心理。“六四”后腐败的迅速蔓

延和人民对腐败的极端憎恨，加重了这种创伤和逆反心理，更加紧密地把“六四”和反腐败捆在了一起。因此，要反腐败，就不能不对“六四”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要抚平专政的刀刃在人民心中留下的深深的创伤，实现国内和解，重塑共产党的威信，也不能不对“六四”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

“六四”最後以流血结束，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的民族缺乏协商谅解的精神，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和能力。在此事件中，希望中国实现民主的外国势力因不了解中国情况，起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而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学生组织者们的幼稚和不顾死活、不知进退，耗尽了政府的最後一点耐心，把一场本来可能很有收获的运动推向了非流血不可的绝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允许人们在自己的政府门前进行长达一个月之久而且遥遥无期、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正常的经济秩序的抗议活动。即使当时采用较为和缓的方案，同学生们进行对话，恐怕也很难有结果。因此，整个事件最後必然而且只能以镇压而结束。关键的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镇压。如果象天津和上海那样出动工人纠察队，甚至象所谓“四人帮”镇压天安门事件那样出动军队和工人纠察队，抓一批人，先把事情平息下来，也不是不可以。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镇压手无寸铁、还是些孩子的学生，还要调动大批军队，荷枪实弹，甚至出动坦克，如果不是决策者认为有军事政变的危险，就是脑子有病。对“六四”的残酷镇压，是一次性质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经济和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使国家经济上濒临破产的话，对“六四”的残酷镇压，则对党和政府及军队的威信产生了几近毁灭性的打击，把党和政府无形中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使党和政府面临政治上破产的危险，也损害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以来所树立的伟大形像。因此，“六四”事件的悲剧性结局，既是学生们的悲剧，也是邓小平同志个人的悲剧，一句话，是又一次国家和民族的悲剧。

对这次悲剧，学生组织者要负一定的责任，没有他们的无知、幼稚和狂热，这场运动不会以流血而结束。邓小平同志和其他参与决策的老干部也要负相当的责任，他们不应该以如此过份严厉的手段来对付一些年幼无知的学生。但真正应该为此负责的还是专制制度这只看不见的手。

在评价和处理“六四”事件时，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把“六四”事件本身同学生组织者分别开来。不能因为学生组织者们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的否认事件本身的目的的正确性，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广大市民和学生包括部份学生组织者们的动机是良好的。

第二，“六四”後流亡海外的学生们，大部份人经过锻炼，变得成熟了，他们对“六四”事件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对国外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进行了一定的观察，学到了国外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要大量地吸引这些人回国，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教育後，可以让他们在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还有少数人，虽然说了些过头的话，甚至做了些错事，但他们热爱祖国、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精神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特别是留学生，身处异国他乡，思乡情深，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情结，对有关中国的事都很敏感，因而常常会有过度反映。没办法，这种感情真是融化在人的血液里，赶不走，挥不去；加上国外的社会制度和观念同国内相去甚远，对国内正面报导的信息渠道又太少，难免长期受到很多消极信息的负面影响；对“六四”事件的残酷镇压在他们心里留下的强烈恐惧和愤怒又一时难以平息；政府方面也对他们施加了一定限制和压力。因此有一些过激的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在建设新民主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这些人还是会转变成为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毕竟他们的动机还是好的，只是爱之深，怨之切，由爱生怨罢了。我前面已多次讲过，民主之路是异常曲折的，几十年来，领导人个人、党和政府都犯了许多错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数千万人死于非命，都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民主之路。回顾二十年来我研究中国问题的思路里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走了很多弯路。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苛求别人呢！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摈弃前嫌，以温暖、开阔的胸怀迎接流落海外、受了很多屈辱的游子们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第三，对邓小平同志的决策失误，一定要本著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对是对、错是错，功过是非要分明，既不因功掩过，也不因过盖功。尤其在这种专制制度下，我们必须接受每一位领导人的全部优点和错误。因此，纠正前任领导人的错误，是每届继任领导人的责任和义务。这既是对本届政府负责，也是对前任领导负责，更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为一己私情包庇错误，任错误继续发展，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做为继任者都不愿去纠正前任的错误，谁还能有这样的权利和权力。一句话，凡是错误的东西，就一定要纠正。不要说是毛邓等人，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例外。

四、派出大量有五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思想活跃、富有创造性、外语熟练的年轻专家，赴国外全面学习研究国外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医疗、社会保障等机构的设置和具体管理制度，为全面改革，实行民主制度从人才、制度、政策等各方面准备条件。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还有诸如国企改革、农业、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但这些都是涉及具体部门和行业的具体技术性问题，由於偏离本文的正题，时间又非常紧，篇幅也十分有限，就不再详细论述了。

第十章 结束语

-- 开启千年盛世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近三千年来，虽然经历了很多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起落和异族入侵之後的民族融合，但中国始终做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家之一，雄踞于世界的东方。可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却衰落了，大大地落後于西方发达国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衰落成为一个屡受欺凌的积弱国家？对其原因有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解释。由於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此我不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但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应该是不容置疑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一是我们古老的文明中积淀了太多的封建成份，大大地约束了人性的自由发展，对人们的心理和生理素质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重官轻商的思想阻碍了经济的自由发展，使得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萌芽并发展。

二是由於封建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无法进行不断的自我更新，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因而总是要经历由盛而衰的过程。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更替是不变的规律。而每一个王朝总是因农民起义开始衰落，更常常是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的内外夹攻下寿终正寝。清朝的衰落从太平天国起义便已开始，即使没有异族的入侵，清朝的寿命也不会太长了。更何况，这次的情况比明末要严峻得多，中国所要面对的已不再是仅有一百多万人口的满族属国，而是强大的欧美西方列强和早已虎视眈眈、如狼似虎的日俄帝国。

第三是两种制度的差距。专制、僵化、腐朽的封建制度同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其差距不亚于冷兵器同热兵器的差距。两者相遇，封建国家的悲惨结局就可想而知。

前事不忘，後事之师。我们目前的制度虽然是社会主义，但实质上同封建专制制度有较大的相似性。如果我们不从制度上进行彻底变革，历史肯定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演。内部矛盾逐渐积累，到一定时候会突然爆发，各国势力也会再次介入，在内外夹攻下，中国将分崩离析、四分五裂，我们的处境恐怕不会比鸦片战争前後好多少。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

首先我们应该正确认识中华文明。要大胆地、非常虚心地、有选择地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政治文明、技术文明、教育文明、艺术文明和其他社会文明，淘汰中华文明中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封建成份。不能因为我们是几千岁的老者，就不好意思向两三百岁的毛头小伙学习，要剃除胡须、放下架子、不耻下问。所谓学道不分先後，有道者为师。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中华文明确实是整个人类文明宝库中最耀眼的明珠之一，它不仅是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也是整个人类的宝贵财富。它之所以历经几千年的起伏波折而仍长盛不衰，足以证明它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同属中华文明的台湾、新加坡、香港的发达，以及华人在大陆以外世界各地所取得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甚至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也可以间接证明这一点，因为日本文化实际上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当今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历经数次民族大融合的中华文明，对整个世界的融合和发展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令人遗憾的是，中华文明在大陆地区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多次的运动和残酷斗争，破坏了很多的民族传统，破坏了人们之间正常的交往礼仪和关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几乎真的要了中华文明的命，以致目前大陆地区除了有著丰富的名胜古迹、古建筑等地表地下资源和部份典藏等硬件外，中华文明的精粹和精神则所剩不多，实际上已形成了断层。而近年来注重发展、忽视保护的思想也对保护文物起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盛行的盗卖倒卖文物之风，则使仅剩的地藏文物又遭劫难。我们自己无能创造新的文明，无力保护祖先们留下来的东西，难道就不能不破坏它吗？因此，在吸收先进的西方文明的同时，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在大陆地区恢复和发扬优秀的中华文明传统。

最後也最关键、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制度。好的制度是众善之本，坏的制度则是万恶之源。美国之所以两百多年来兴旺发达、不断向上，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其富有活力、不断完善的制度则是根本原因。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当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政府的决心，大胆改革，彻底废除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专制制度。我们已没有退路，我们已无可选择，我们必须变革，我们必须实现民主，我们必须成功！！我们决不允许戊戌变法的悲剧再次重演。在目前情况下，新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是唯一能够被海内外各方、党内外、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所接受的民主方案

因而也是中国和平顺利地实现民主的唯一途径。希望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全军上下对此能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虽然从长远来看，或者从後人的眼光来看，新民主社会主义也许并不是最完美的制度，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它是最适合中国的制度，因而也是最好的制度。一种完善、稳定的民主制度不是一种机械式的制度，而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它能够不断地及时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不断地完善自己，从而把国家带向永久的繁荣富强和欢乐和谐。我相信，新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制度。

在文章的最後，我要再次向海内外全体同胞大声呼吁，不论贵贱、贫富、民族、国籍、宗教，让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同努力，促进两岸三地、和国内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的沟通、理解、谅解和协作。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圆百年之民主富国梦，启千年之太平盛世！！！！一个高度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开放、和谐、统一、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屹立在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祖国万岁！！！！ 人民万岁！！！！

浩乾 于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注①：势能指权力和能量

政治势能 = 职位势能 * 个人能力指数 * 个人威望指数

个人能力指数 = 个人能力/平均个人能力

个人威望指数 = 个人威望/平均个人威望

注②：综合势能 = 政治势能 * 经济势能

团结一心，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建设一个高度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开放、和谐、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国

——致各位新老领导人

经过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我们的国家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落后、低效、单一、垄断的上层建筑越来越不能适应先进、高效、多元、竞争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矛盾日益尖锐。中国向何处去，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道路，再次成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甚至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我们坚决不能答应的，也是革命先辈们所不能接受的，无数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更是死不瞑目。如果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不如早早地给国民党缴枪好了。那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搞了，红军时期革命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不是白打了，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不是白流了，那些革命先辈们不但不是人们的英雄，反而成了人民的罪人。真是岂有此理！！

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也说明了我们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苦难之路、通向地狱之路。

实际上这些年我们国家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恰恰是因为我们迷失了方向，背弃了人民，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过度资本主义化所致。

看一看现在整个国家的情况，政府官员腐败堕落，令人发指，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没有思想、失去灵魂、信仰崩溃，娼妓遍地、毒品泛滥、黑社会横行，贫富悬殊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生活极度困难，这那还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这样啊。

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有很大缺陷的。我国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和前苏联的解体都证明了这一点。为了纠正传统社会主义的缺点，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情况有所改善，但这些改良性的措施，实际上是以退为进，使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回到了五十年代初的状况。根本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在政治领域我们仍然实行的是落后、低效、单一、垄断的一党制。人民共和国里的人民却无法对国家行使管理权，无法监督和管理政府官员。

实际上，“客观地总结我们国家五十多年来的艰难历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迄今为止，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一切苦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责任要归咎于这个要命的制度。这是一个令同志相害、兄弟相残、萁豆相煎的制度，一只让整个国家深陷旋涡而不能自拔的看不见的黑手，一个让人人发疯、人害人、人恨人、人吃人的魔鬼的咒语”（正文）。

这种制度在毛泽东时代给国家带来了一个接一个的巨大灾难，其危害尽人皆知，在此就不再详述。八十年代，即邓小平时代，是休养生息、拨乱反正的一段时期，制度的缺陷暂时得到了掩盖。可以说，邓小平时代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毛泽东时代所犯的错误。没有毛泽东时代所犯的错误，就没有邓小平时代，其成功更是无从谈起。到了九十年代，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时期，随着纠错任务的完成和休养生息阶段的结束，国家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制度的缺陷又逐渐显露出来。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大量问题的出现，有些甚至已极为严重。

对毛泽东时代出现的问题，很多人都归因于毛泽东个人。同样地，对九十年代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大多数人都归罪于江泽民同志。这是极其错误、极其荒谬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制度问题。邓小平时期是很特殊的一段时期，这短短十年多的成功是以毛泽东二十八年中所犯的许许多多的错误为前提的。因此不具有代表意义，不能反映我们这种制度的本质。不断地引起决策失误、带来大的问题、大的灾难，才是我们这种制度的特征。

可以断言，如果我们我们不狠下决心，彻底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新一届领导人，以及后来的几乎每一届领导，都必不可免地会犯错误，而且是许多大错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说实话，这十三年，能够在面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的情况下在成堆的问题中 不断前进、高速发展，没有出现大的政治动荡，真是一个奇迹。因此，对这十三年，要客观地予以评价，虽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功劳是主要的，发展是主流。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集体努力奋斗的结果。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和传统的社会主义，都不能引导中国走向民主、繁荣和富强。如何寻找出一条既能保留社会主义的优点，又能吸收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政治文明的两全其美的正确道路，这是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在二十多年冷静而艰难地思考中国未来之路的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许多想法，并在此基础上，于二零零一年底产生了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从而使得这个问题总算有了一个最终的答案。

在正文中，我从追求民主的角度对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做了简单的整体的回顾和总结。继而分析了非民主制度的危害，一党制与民主的关系，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在此不再详述。仅就民主对每个人的利害关系再讲两句。

其实，民主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有时候甚至是性命悠关。如果中国有民

主，江主席不会被斗得晕倒在地（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反革命帽子是戴定了的），朱总理就不会做二十年的右派，胡主席也不会下放刘家峡劳动。那都是些非常艰难的岁月，是不应该忘记的，更不应该忘记，有很多人，因为没有民主而含冤致死，下至普通百姓，上至共和国主席。有些人讲，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反正以后不会再有运动，不会再有文化大革命。我看恐怕没那么简单，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有可能重演。后来不是发生了“六四”事件么？再后来呢？如果不改革，我看要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的。一日不实行民主，派性斗争就一日不会停止，而且这种派性斗争比宫廷斗争更黑暗、更残酷，即使位高权重，也难保证安全。退一步讲，你保得了自己但你能保证自己的子女和后代吗？我看不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莫过于时间，时间可以使一切荣华富贵化为尘，“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时间也决定了每个人总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因此，没有任何人在离开这个世界后还能保证自己后代的福祉，唯一可能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安全、公正的国家。说句心里话，您愿意让您的后代，比如说孙子、曾孙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官员腐败堕落、道德沦丧、娼妓遍地、毒品泛滥、黑社会盛行、没有任何保障的社会，甚至身陷其中吗？我想决不会。也决没有哪一个人愿意。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事业有成的学者、财力雄厚的企业家、生居高位的政府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们要移居国外的主要原因。其实国外有什么好，语言不通、饮食不惯、风俗各异，又是二等公民。饭还是家乡的香，月还是故乡的圆。中国人“无论何地、无论何地”，都难忘他们的父母、家乡和祖国，还有那五千年的文化，“这种感情真是融化在人的血液里，赶不走，挥不去”（正文）。有许多人，入了别国国籍，还要时时关心祖国，回家乡投资。还有些人“更可笑”，做梦也想着中国的民主和繁荣，其实中国的民主关他什么事。没办法，这就是中国人，“流在心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么多人还要千方百计出国，“身在异乡为异客”呢？为的是有一个自由、宽松、公正、安全、稳定、正常的社会环境。

普通人无法改变社会，他们唯一有可能做到的，就是离开这个社会。而诸位身为国家领导人，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通过改革而改变这种社会环境，为什么不去做呢，难道要让您的后代骂您甚至诅咒您不成？

几千年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为了维护自己政权的稳定。从精神上、肉体上千方百计地奴役、束缚我们的人民。其中尤以宋代以来最为严重。一套又一套吃人的封建伦理道德，加上极端专制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肉体上的折磨，严重摧残了我们的民族。万恶的贞节牌坊吃掉了多少妇女的性命，裹小脚又使一代又一代的母亲成了半残疾。长期奴化、压制人民的结果，使得民族越来越弱。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一千多年来数次亡于弱小异族的原因。‘先是弱小的蒙古族灭了人口和国力几十倍于自己的宋朝，后是仅有一百多万人口的满族属国灭了几千万人口的大明朝。在抗日战争中，仅仅六十几万人的日本军队（不算关东军，那是准备对付苏联的），

打得中国军队难以招架’（数据取自一篇网上文章，记不清作者和来源，在此致歉）。对内弱民，对外必弱国。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啊。经过上个世纪的数次革命，封建思想得到了清算，妇女得到了解放。但是封建余毒毒害仍然很深。尤其在政治领域更为严重。官大于民、官管民、党大于政府、党大于法、政府大于法、党政重于民的思想根深蒂固。政治制度上仍然实行的一党专制和个人专制。个人专制是封建专制、一党专政也是封建专制。如果我们再不实行民主改革，恐怕老百姓要欢迎国民党回来了。

希望诸位能好好地想一想，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也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彻底解放我们的国家，解放我们的人民，还权于民、还给他们自由吧！！！！

各位领导人都子女在国外，学有所成，有些已学成回国，希望你们能开诚布公地跟他们谈一谈，了解一下国外的情况，也希望那些在国外留学或学成归国的领导子女们，能够为国家，也为你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着想，把国外的真实情况告诉你们的长辈。当然更欢迎那些正在国外留学的领导子女们，在辛苦求学的同时能留心考察一下国外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吸收其长处，然后把这些想法转达给你们的亲人，使他们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我相信，这些年轻的一辈，一定会比他们的前辈们强得多。

自从“六四”以来，国内领导层对民主政治多少有点忌讳。一方面，一提起民主，好像这是民运人士的主张，担心提倡民主政治会受到党内保守派的攻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共产党一直在追求民主，这个世界上最需要民主的还是共产党自己！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民主是一件很艰难、很高深的事，担心搞民主会天下大乱。这种顾虑也没有必要，恰恰相反，不搞民主才会天下大乱。其实说透了，民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克服畏难心理，下决心去做，很容易实现，不会出问题的。抬腿迈过，蓦然回首，原来不是什么高墙，不过是一道低门槛而已。

我在这里说民主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说，民主不是万能的。这也是许多人反对民主的一个逻辑荒唐、思维混乱的借口。诚然，民主确实不是万能的，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民主无用的结论。空气是免费的，也不是万能的，有了空气并不等于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有车坐、有爱情，但是不是就由此可以得出空气无用的结论呢？我看没有人会、也没有人敢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有人不服气，那他就捏住鼻子试试，看看他能不能坚持二、三十分钟的，如果真有人能做到这一点，那这个结论就对他不适合，因为他要么是神仙、要么是……嘿嘿。

换一种说法，民主是一个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不论经济多么发达，都不过是一条独腿单臂龙而已。

实际上除了民主，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如人口问题、农业问题、失业问题、环境问题、科技问题、教育问题、台湾问题等等。我们不能让政治民主化这么一道低门槛就给挡住了。

就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痛下决心，彻底改革，做一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天辟地的大事，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开放、和谐、发达的人间乐土！

在最后，我还要讲一下团结问题。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又有说法，佛赞佛，佛门兴旺。还有说法，人帮人，家家乐，人害人，家家悲。当今世界不太平，国际上，国与国之间，没有有效的权力机构和法律予以约束，仍然是实力说话的时代，中国的处境并不令人乐观。而国内则是问题成山，矛盾尖锐，还有一个台湾问题。大家一定要居安思危、精诚团结、志可断铁。有事多商量、多沟通、多谅解，切不可搞分裂。尤其是新老两代领导人之间，新一届领导人要尊敬老一届领导人，老一届领导则要全力支持新一届领导。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上一届领导干得好，我希望新一届领导干得更好，我也希望后来的领导人比现在更强。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越来越兴旺发达。否则，一代不如一代，那不是要亡国灭种了，如果人人都这样想，恐怕人类早就不存在了。人的天性，总有自私的一面。我有个外甥，学习很好，有一次，我姐对我说，“外甥将来一定要超过舅舅”，我当时虽然嘴上在应酬，但心里很不是滋味。没办法，人就是这么个自私的东西，就是亲父子之间恐怕也会有这种情况。人老了以后，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所谓老人孩子，老人有时候就像小孩一样，还特别固执。希望大家对这一点要有一定的认识。

尽管我苦口婆心讲了以上一大堆，但仍然不能排除，党内有些人利令智昏，搞分裂活动。因此我还要再讲一点，如果有人敢致乱天下，我敢说，将来收拾局面的决不会是现在的各位（包括中央委员五十岁以上者），如果有幸有人能够收拾局面的话。年龄不饶人啊！人的一生，三十岁是一个界，五十岁是一个界，七十岁又是一个界。不信你找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跟一个二十岁的小伙比一比。不服老不行！既然不能收拾局面，那还是不要捅乱子的好。

总之一句话，还是和为贵，家和万事兴，诸位和则国兴。

我相信，我讲这些话，是多余的。但是，最近传言较多，所以多写两句，以防万一。晚辈一片赤子之心，赤者，红也，所以难免火气太旺，不当之处，还望海涵

浩乾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二日

正确认识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特征，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大旗

写完【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社会主义导论】已整整两年。由于文章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所以在国外是无法发表的。而对于国内来说，文章的观点过于超前，所以也不可能发表。好在有了互联网这种最新的媒体，也有了网上繁若晨星的论坛，所以我的这篇文章幸运地逃脱了尘封箱底，永不见阳光的命运。尽管如此，由于对文章的影响和后果没有把握，又担心对国内政治产生冲击，所以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有机会读到。

中国新民主社会主义是我独立思考中国问题过程中得出的思想，与目前以及历史上流行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的渊源。多年以来我一直是一边观察社会现实，一边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兴趣去阅读那些书本文章。因为我知道，中国的问题要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思考和解决，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和书本知识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也没有任何一位故去的伟人和哲人

能够指导我们。事实上，我也是在写完文章后的同一天，偶然读到冯崇义先生的【第三条道路世纪梦】一文，粗读之后，得知以前就有过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思想流派。但我还是没有太在意，毕竟我们的新民主社会主义，核心和实质是社会主义。

为了同这些各种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有所区别，也出于年轻人的虚荣和霸气，我给这种思想取了一个自认为响亮的名字：【民主社会主义总论】。再后来，在创建中国盛世网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俞愚先生，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工人理论家。多年来，他一边工作，一边坚持理论研究，写下了三十万字的著作（至今不能出版）。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目前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及新社会主义理论流派比较熟悉。他建议我最好不要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个名字，因为除了历史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外，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另外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目前在国内也很流行，传播这种思想的人相对比较多。从那以后我开始认真考虑给我们的新思想取什么名字，以便同那些毫不相关的理论相区别。没有一个合适的名字，鱼目混珠，实在是一见令人苦恼的事情。

要给这种思想取一个合适的名字，就必须准确了解这种思想的特征和历史渊源。

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邓小平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想）相比，中国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有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社会自由思想。我们讲的自由，不仅仅是个人自由，也包括团体法人的自由；不仅包括传统的言论、结社等自由，更强调经济自由，即自然人和团体法人从事科研、生产、经营、商贸、运输等的自由。其中经济自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吴敬琏以及农村承包制的试行者都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少奇同志的“三字一包”主张则是这种思想的最早渊源。

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思想，这是一个正在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党和国家的历届领导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民间学者顾准（听说顾先生在六、七十年代就主张两党制，但是一直没有看到有关文章）、俞愚、华炳啸、胡星斗等在这方面都进行了有益而艰难的探索。毛泽东同志大胆而天才的探索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是和谐思想，以追求人和社会、自然的和谐，追求人民生活的最大幸福为目标。而不是追求产值、追求利润、破坏自然环境。

同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相比，民主思想是中国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大进步，也是我们思想的精髓。由于以上原因，我始终不愿意也无法去掉“民主”两个字。

中国新民主社会主义的渊源，追根究底，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会认为我是在找靠山，拉虎皮做大旗，也有些人认为我很可笑。其实，实事求是地仔细想想，也只有这些渊源。为什么呢？

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列宁主义，就没有苏联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恐怕就不会那么快传到中国，中国共产党恐怕就不一定能够诞生和成功；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够建立。而没有邓小平同志，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理论，也不会有改革开放，西方的民主思想就不会传入中国，从而就不会有中国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

我是一个笨人。没有这些先辈，我现在也许还在读四书五经，甚至很可能还在面朝黄土、背朝青天、忙于辛勤耕种，那能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更不用说产生中国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人不能忘本，所以中国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绝大部分功劳还要归与那些伟大的先辈们，我个人不过是搞了点名词组合而已。

基于这种想法，我也没有采用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虽然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响亮，很有号召力），因为如果把我们的这种思想称作新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以前的社会主义就成了旧社会主义，这样很容易对前人及其思想产生负面评价和影响，甚至同陈旧、反动和黑暗联系起来，也割断了我们同前人的联系，割断了我们思想的根。

我之所以采用中国新民主社会主义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原因，是以此做为对伟大导师毛主席及其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纪念，希望以此理论圆他老人家的梦想。毛泽东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一生是无畏奋斗的一生、勇敢探索的一生，他领导人民和军队取得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方面领导全国人民在一穷二

白的基础上建立了基本完善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击败了不可一世、从未吃过败仗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挫败了苏联的野心和封锁，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完整（想起来在那种四面强敌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确实不易。可笑世人直到现在还把文化大革命期间搞个人崇拜做为毛主席的一大罪状，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一定笑破了肚皮。世人之愚，可见一斑）。以上这些功绩都是人所共知的。其实毛泽东一生还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和党代会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一点，没有人（包括拥毛者）承认，也极少有人认识到，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认识到。一方面因为这种民主制度很不完善，到后期流于形式，甚至名存实亡，另一方面，由于民主试验的失败，从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实际上别无选择地走向了个人专权。所以在几乎所有人心中毛泽东是一个专制型、帝王型的领导人。这种看法从表面上和形式上看，确实是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很肤浅的。其实，毛泽东同志一生都在苦苦思索、不懈努力地探索建立社会民主制度，这一点从他青年时期的思想、以及同黄炎培的谈话（<http://www.greatchina.biz/bbs/index.php?showtopic=879&hl=黄炎培&st=45>）、新民主主义思想、以及最近披露的周恩来同志传达的他的讲话内容（<http://www.greatchina.biz/bbs/index.php?showtopic=2671>，周恩来同志谈一党执政与我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人民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可以看出来。由此可见，我在正文中对毛泽东的这种定位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最后走上个人专权，一是由于当时的世界政治环境，二是因为他过早过快地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了社会主义，三是他走入了一党制下民主这个永无出路的迷区和误区。但在他的领导下所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因为这种制度可以很好地代表社会的

各个阶层和职业，使得普通的人民群众也有机会参与国家的管理。

由于以上原因，我把这种思想称作中国新民主社会主义。当然，考虑到它的三个特征，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和谐社会或民主和谐社会。

这些年在海外研究考察，一方面使我认识到，现有的西方民主制度，同专制制度相比，确实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进步，是质的飞跃。这种文明起源于罗马帝国，真正创立和发展于资本主义时代，但它将像自由的灯塔，照亮整个人类的航程，永远为整个人类文明所共有，而不是为资本主义所特有！！！那种首先将西方民主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划等号，然后再列举出其有各种缺点，从而彻底否定抹黑这种民主制度，进而完全拒绝民主制度的做法，是完完全全的无耻的诡辩和狡辩，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种诡辩论从今天起可以休矣。

中国要发展，要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生活幸福，要融入国际大家庭，就必须虚心学习，总结现有各种民主制度的优缺点，只有这样，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一关必须过，别无它途！

另一方面，我也切身感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确实不是人类的未来，也不是我们前进的目标。这种制度天生是自私、贪婪、虚伪、冷酷无情，因而是不和谐、不幸福的。资本主义下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其创立的时间太长，所以有很多缺点，到最后成了富人和上层精英的盛宴。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从三个方面不懈努力：

第一，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做为基础，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其他经济为补充的混合经济制度。因此，通过科学合理的改革，让国有企业恢复活力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根本性的大事。

国营企业今天的艰难处境，一方面归因于其落后僵化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特别是后来实行的承包制；另一方面要归因于政府当年特别扶持外资和私人企业的政策。事实上，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关键是其内部的管理制度。而不是姓“国”还是姓“私”。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早在 95、96 年，我就有成熟的改革方案，但考虑到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国有企业改革，而是政治改革。如果政治不改革，政府的管理和运作方式不改变，再好的改革方案都会流于形式，都会被那些强盗们做为抢劫的借口，所以这种方案一直没有公布过。转眼将近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人提出类似的方案。我愿意再耐心地等待十年，直到适宜的政治环境出现为止。说到这里我顺便谈一下最近很火爆的郎顾之争，我大概浏览了一下郎咸平的文章。毫无疑问郎咸平的观点是对的，这是不言自明的。不但应该立刻停止国有资产的出售，而且对已经出售的国有资产，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全部重新进行审核和评估，对其中官商勾结、自买自卖、明火执仗抢劫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强盗，决不轻饶，必要时可以对这些人采取极端严厉的措施。但郎咸平提出的职业经理人代理制度，只能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而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办法。至于顾维军、周其人等人的

观点，至今我还没时间看，所以不能发表评论，请大家不要因为我肯定郎咸平就认为我反对顾维军、周其人等，他们的观点就一定是错的。世界上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第二，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做斗争。

首先必须同各种社会主义悲观论做坚决的斗争，要坚定地高举社会主义这面大旗。

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经过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发展，通过在欧洲、苏俄、中国的实践，经历了非常艰难曲折，甚至是非常痛苦的发展历程。既有国际反共集团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围困，也有内部的争斗，还有重大的思想错误和政策失误。随着前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走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现在社会主义又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在世界上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认为社会主义必然破产失败的泛资本主义化、泛私有化、泛自由化思想非常严重，在社会各个阶层很有市场。这种情况在党内甚至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也非常严重。那种认为国有企业没有出路，必须从很多领域退出，甚至全面私有化的思想就是其中泛私有化的典型代表。

国际反共集团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围困没有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我坚信，泛资本主义化、泛私有化、泛自由化思想也不能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用我在正文中的话来讲：“野蛮资本主义是一条通向地狱之路，我们宁肯再次举起红旗，扛起枪，决战中原，也决不答应野蛮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继续”。

其次，必须同党内的保守势力进行思想交流。这种人不能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大胆改革，而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坚持落后陈旧的政治制度，拒绝改革。这些人绝大部分是我们的同志和朋友，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毕竟现在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已经不多，有他们在，我们不会感到孤独无助。我相信他们的思想是会转变的。

最后，必须同官僚资本集团和其它既得利益集团做坚决的斗争。之所以把这个集团单独列出来，是因为这个集团非常特殊，它介于上面两个集团之间，不属于以上集团，但却同时具有两者最典型的坏特点。政治上，这个集团属于保守势力，顽固坚持陈旧的政治制度，坚决拒绝改革，以保护其手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经济上则声嘶力竭地主张泛资本主义化、泛私有化和泛殖民化，以最大限度地合理合法地攫取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企业、国有土地以及一切一切能够瓜分的国有资产并将攫取所得合法化。这个集团是中国政治改革最坚决的反对者，也是毁灭社会主义经济的罪魁。

第三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并通过合理的政治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我在文章中提出了七个变种方案，这些方案在建设民主方面虽然有所创新，但在保障社会主义制度方面不是很令人满意。这一点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写完文章后我一直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有了一些很好的新想法，但为了保持原文的完整性，就不再补充。

最后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我在文章中省略了涉及台湾问题的部分，因为台湾问题有很多谋略可以运用，所以不能公开。这篇文章刚写完之后，曾寄交李光耀先生，关于台湾的部分他也是看过的，在台海紧张的时候也曾写信请他调解。另外，为了调动美国方面，化解美国对台湾问题上的阻力和干涉，我曾致信美国前总统卡特（同时请他转交布什总统），从美国的角度谈了我对台湾问题的思路。从最近半年的动向看，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几乎 180 度的转变。但是国内方面，虽然我想尽了办法，却始终无法建立沟通渠道，以致政府方面一开始无法完全理解其他各方的想法，有点被动，但这样反而有非常大的妙处，反而有利于事情的解决，这也许是天意吧！在中美三方微妙而有趣的互动过程中，将会经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陆积极，美国反对，台湾反对。

第二阶段，大陆积极，美国不反对，台湾反对。

第三阶段，大陆积极，美国积极，台湾反对。大陆和美国会对台湾施加很大的压力。

第四阶段，有两种可能：取决于未来台湾的总统选举结果。

1. 绿党继续当选当政。大陆积极，美国积极，台湾被动，大陆对台湾进行局部打击，台湾被迫同意和平统一。

2. 国民党当选，很可能是年轻有为之人当选。大陆积极拖延，美

国积极，台湾积极。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出现。

第五阶段，大陆积极，美国积极，台湾积极，两岸通过协商达成统一。

对于做出以上判断的原因在此不能详述。总之，美国已经由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转变成为促进两岸统一的最积极因素，台湾绿党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国民党会赢得下一次大选，两岸将最终统一。

如果绿党不能认清形势，尽快转变其政策，而是继续推行“独立”政策，大陆将不得不对台湾实施毁灭性的局部打击，对陈水扁和其他台独骨干核心采取斩首行动，同时一举摧毁台湾的海空力量和重要军事设施，并占领台湾外岛，迫使台湾统一，绿党将不复存在，少数台独和反华骨干分子将被清算。在此过程中，美国仍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除非当时的美国总统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或者陈水扁的脑子出毛病。

所谓世事如棋。台湾问题和中国的统一就这样在一念之间定下来了，如果下一个问题能够顺利解决的话，世界未来的格局也就这样在一念之间定下来了。但愿人类有一个祥和幸福的未来！至于我自己，我已经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目标，如果一切顺利，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能逐渐为大家接受，中国能逐步朝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开放、和谐、发达这个方向顺利发展的话，我将云游四方，探求人生真谛，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走累了，我会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微笑着离开这个世界，来无名，去也无名。

第二，文章中提出的几种方案只是粗线条的基本的政治制度框架，缺少详细的机构设置和具体的制度条例。我之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多写，因为这都是技术性的东西，只要大的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不难解决；另外，这些问题比较繁琐，不是一个人的精力能够胜任的，所以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分工协作才能完成；更重要的是，这是涉及全国人民的大事，需要大家来参与，大家共同选择，共同决策，不能由少数几个人说了算。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在文章中我没有谈到，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推出我的方案的时机尚不成熟，另外我实在没有时间写这方面的文章。

2004年是祖国大吉大利、欣欣向荣、喜事不断的一年：奥运健儿捷报频传，获得奥运金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为祖国和中国人大大地长了精神；中央全会顺利召开，新老两届领导顺利交接，使得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交接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保证了国家长期的稳定；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内政治气氛更加宽松、自由，政治思想空前活跃，新思想逐步涌现，新一届领导灵活、开明、务实、亲民、果断，多次表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愿望。受这些好消息的鼓舞，我决定公开推出【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社会主义导论】。该文只是勉力对我思想的大概汇集，并不是很系统，不能算是一篇鼎力之作。如果能以此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未来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密切关注和讨论，为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起一点点作用，我就很开心了。文章不足之处，欢迎大家补充，不对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浩乾

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德国

对江泽民同志十六大留任的看法

——写在十六大以后

同全国很多正直的人一样，听到江泽民连任军委主席的消息，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极度失望，怒不可遏。我也是连续几天气愤难当。一怒之下，我决定删去所著《中国向何处去 -- 民主社会主义论》一文中所有对江泽民的赞美之词。可以说，这几天，江泽民的形象在我这个一向看事情比较冷静、公正的人眼中一落千丈。

生气归生气，冷静下来后，以往的看法又涌上心头，并逐渐占了上风。让我还是从头讲起。

仔细回顾和分析一下十几年来人们对江泽民的评价的发展轨迹，可以将这种评价归结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邓小平同志去世以前。这一阶段，江泽民同志是很受人们欢迎的。人们把所有的不满和愤怒都投向邓小平。这种不满来自于四个方面（顺便离题多讲一点）：1.前后废黜华国峰、胡耀邦、赵紫阳三届党的领导人。2.下令镇压"六四"事件。3."六四"后腐败的迅速蔓延。4.以普通党员之身,继续垂帘听政。邓小平以其拨

乱反正立下的丰功伟绩，抵挡了一切的不满和指责。如果换了另一个人，任何一项罪名都可以使他遗臭万年，偏偏这个人是大大家都感恩戴德、恩泽天下的邓小平，所以大家也只好瞪大生气的眼睛、面带微笑默认了。

以上四点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华国峰为人忠厚、加上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因而受到的人们的同情。胡耀邦因反腐败、主张开明的政策而受到人们的欢迎，赵紫阳则同"六四"和反腐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邓小平受到人们的批评形成对照的是，这一阶段的江泽民却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知识界的普遍欢迎，在很多学生们的心目中，他就象一位受人爱戴的师长（非军长、亦非市长，轻松一下！）。另外，这一阶段人们对他都很有同情。第二阶段是邓小平同志去世以后。这一阶段江泽民的形象逐渐走向了负面。没有了邓小平，江泽民没有了约束，大权在握，可是他也少了一个为他遮风挡雨、承受指责的巨大屏障。人们便逐渐把"六四"和腐败同江泽民联系在一起。江泽民几乎成了腐败的代名词。我周围那些曾经非常敬佩崇拜江泽民的人个个都成了反江派。这期间，我对江泽民的看法也曾一度非常消极。我对江泽民的看法发生第二次转变是在去年底我产生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后。我认识到，这种一党专制的制度，乃是万恶之源，要为建国以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几乎一切苦难负最主要的责任。不仅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罗瑞卿等人是受害者，连林彪、江青等人也是受害者，甚至毛泽东、邓小平也因之成为悲剧性人物。同样地，腐败的根本原因还是这种制度，而非领导者个人。于是我开始观察分析各位领导人，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我发现党内有一大批人包括江泽民、朱熔基、李瑞

环、胡锦涛、曾庆红等实际上都是非常赞成民主的，他们也一直在探寻中国实现民主的途径，只是由於民主问题的复杂性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及各方面的限制，一时还难以找到比较理想的实现民主的道路。江泽民同志就曾讲过，'腐败的根源是没有民主'（摘自序言）。

令人遗憾的是，我也认识到，江泽民、曾庆红等人有可能并正在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如果不能对这种制度的巨大的惯性和魔力有充分的认识，痛下决心果断变革，人们将会把对腐败的憎恨迁移到他们身上，把他们当作腐败的根源和保护伞，当作腐败的代名词，悲剧将再一次在他们身上重演。

由于以上想法，我对江泽民等人的看法再一次变得公正、客观、积极起来。因此，当看到网上大量有关所谓江湖之争、胡曾之争的文章时，我只是置之一笑。因为我知道，实际的情况与表面现象往往正好相反，一般人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江泽民这次没有一退到底，我想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 壮志未酬，心有不甘。邓小平在世时，他要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难以完全实现自己的思想。邓小平去世后，按说他应该有机会大展宏图了，可是千头万绪，很多事一下子还难以理顺。即使认识到了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腐败的根源是没有民主，可到底怎样实现民主，实

现什么样的民主，却一时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再说党内还有很强的阻力。因此，过去的五年来，他在政治上可以说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虽然本来他完全可以在国家的民主和统一的问题上大有作为的。现在，他已执政十三年，不下无论如何是不行了，再说年龄不饶人啊！所以，他只能选择先半下，再全退的方式了。

2. 江泽民曾经讲过，他有几个没想到，其中一个：他没想到人民的怨恨是如此之深。本以为太平盛世，万民乐业，德泽万民，却没想到人民对他怨恨甚深，视他为腐败的代名词，他无法接受，他内心难安！他想再争取点时间，抓紧机会，多干些事。

近一段时期，人们对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和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的主张意见甚多。尽管我对这两个主张有不同的看法，但由此也能看出，江泽民同他的同事们实际上一直在苦心积虑，寻求突破。虽然最后所选择的突破方向是不正确的。

综上所述，大家对江泽民的留任没必要过度反应。我相信，他一定会在明年的人代会上卸下国家主席的职务，并在两三年内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我深信，江泽民是高瞻远瞩、深明大意的。他仍然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师长。

因此，关键的问题不是他是否留任，而是他留任和卸任后做些什

么，他是否对当前的局势有清醒的认识。

我认为，在有生之年，不管他是否担任职务，都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坚持不懈、鞠躬尽瘁，发挥重大作用：

1. 关心人民,关心弱势群体。象江上青烈士一样，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将会利用空余下来的时间，多深入基层，多访问经济落后的大西北和东北地区。

2. 他将会同朱总理和新一代领导人一起，继续高举反腐败的大旗。

3. 更重要的是，他会对非民主制度的危害有更清醒的认识，因而不遗余力地同其他领导人一起，推进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并同时促进国家的统一。诚能如此，他一定会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民主、统一、发达、强盛的中国。

4. 学习邓小平晚年的成功经验,而又避免他晚年所犯的错误,清醒认识专制制度是一个吸力无比巨大的黑洞,同时清醒认识老人政治的弊端,全力支持胡锦涛、吴邦国、曾庆红、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

以上四点，是我的判断，其实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人生如梦，富贵似粪土，名利若浮云。我想江泽民会做出正确的决策！最后我希望各位新老领导人，多考虑国家和人民，少考虑个人；多干实事、少图虚名；多看长远、少看眼前；多搞团结，少搞个人主义。痛下决心，彻底革除时弊，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开放、和谐、发达、

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顺便提一下，为了为政府方面提供一种在中国顺利实现民主的方案，也为了促进国内外各方面、特别是党内开明人士同党外民主人士之间的沟通、谅解和协作，我集二十多年思考的结果，用多半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写下了《中国向何处去 --- 民主社会主义论》一文，准备在明年初发表。可以说，这是当前中国的唯一出路。我写这篇文章，完全出于一片赤子之心和对人民的热爱之情，没有任何名利之心，因为署名也是化名。但由于文章观点介于党内极端保守思想和党外极端民主思想之间，很可能为两方面所不容，再加上文章太长，全文约三万字，不太适合一般期刊杂志发表。在此向大家求助，欢迎大家提供意见、办法和信息。想不到诺大的中国，居然找不到我发表一篇文章的地方，难道天亡中华？我不相信！

拜谢！

尚乾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